

**怀故人**

# 为母则刚

孙为刚

“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”是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梁启超在其惊世之作《新民说》中提炼出的一个观点。意思是说女人原本是比较柔弱的，而一旦成为母亲之后，则会因为母爱的天性和本能，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刚强和勇敢。

我的母亲冯吉美就是一个“为母则刚”的范例。

我的左侧股骨头位置，有一个1元钱硬币大小的疤痕，这是当年得了一种叫做“贴骨流”的病留下的。

“贴骨流”也称“附骨疽”，是一种毒邪深袭、附骨而生的化脓性疾病，即使在今天，也是一种比较难治且致残率很高的骨科顽症。不幸的是，我在四五岁的时候患此顽症。我姥姥在世的时候，经常叫着我的小名说：“小×呀，你小时候得了‘贴骨流’，差一点儿成了‘瘸子’。”

关于治疗“贴骨流”的过程我已经没有多少印象，是长大后从姥姥断断续续的述说中依稀想起了一些当年的情景。

那是个大热天，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母亲抱着（或背着）我去医院。治疗过程的痛苦难以言状，每一次手术或换药都是一次痛不欲生的劫难。医生用手术刀切开患处，放出脓血，然后用刀片刮去骨头上的病毒，再将带药的纱布塞

进伤口。我拼尽全力地挣扎，声嘶力竭地嚎叫。母亲和护士则用尽全身力气摁住我拼命挣扎的身体。每一次治疗，母亲都是满头大汗，满脸泪水。几天后的换药同样是一场酷刑。换完药，身材不高的母亲背着已到她腰间的我，一步一步地走回家。如此反复地刮骨、换药、塞纱布、包纱布，我的“贴骨流”终于治好了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，只是留下一个圆圆的、浅浅的伤疤。后来，我读了《三国演义》，知道了“刮骨疗毒”一词。我想，我治疗“贴骨流”的经历大概就是刮骨疗毒吧？！

令我疑惑不解的是，我长大后，母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及当年她带我“刮骨疗毒”的艰辛和付出，但我知道，那份担心、焦虑和煎熬，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心灵深处，不愿再次触及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10岁那年的秋天，一个风狂雨骤的夜晚令我至今难忘。

那时，母亲在离县城30多华里外的一个农村供销社工作。那天晚上，只有1岁的弟弟，发了几天高烧后突然身体抽搐，眼珠上翻，情况十分危急。村医说，赶紧上县医院吧，再晚了孩子怕保不住。当时的农村，没有救护车，也没有机动车，父亲在几十公里外的人民公社工作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外面，狂风携着暴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闪电划过夜空，炸雷隆隆而过，两个妹妹吓得蜷缩在炕角嘤嘤而泣。

去，还是不去？母亲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下刀子也得去！”母亲请来供销社年轻力壮的李宝喜叔叔，让他在自行车上绑一个偏筐，上面搭上块雨布，把弟弟放在里面。母亲穿上雨衣，带上手电筒，一头扎进了狂风暴雨中。那一夜的艰辛，我无从知晓。几天后，经确诊患脑膜炎的弟弟因抢救及时，转危为安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，后来还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战士。

也不用再说了，是死是活都在一块儿了！”更为严峻的情况还不止这些，母亲当时因为照顾父亲而失去了工作。

父亲患病后不久，由于病情加重，生活不能自理。由于当时的干部政策尚不完善，加之正值“文革”，整个社会管理混乱，父亲的护理要求无人理会，母亲只好承担起照顾父亲生活的重担。为此，单位让她辞职，母亲坚决不辞，单位的领导就说：“你不辞职就发给你百分之四十的生活费！”

父亲去世后，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没有了，母亲百分之四十的生活费只有不到20块钱，加上我们兄妹4人的遗属生活补贴，全家5口人加起来的生活费只有40块钱。在那个年代，这些钱只能保证有饭吃，

饿不死人，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。刚强的母亲没有向生活屈服，没有向命运低头，她勇敢地挑起了这个五口之家的重担。

父亲去世后，不用再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了，为恢复失去的工作，母亲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。写材料、上访、申诉，当时的掌权者走马灯似的，一会儿工宣队，一会儿军管会，一会儿又是复出的老干部，母亲上访、要求恢复工作的节奏不乱，步伐不停。遭遇的冷脸、白眼乃至呵斥不计其数，母亲据理力争，针锋相对，绝不退让。

两年后，母亲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，上级落实了政策，母亲重新恢复了工作，恢复了工资待遇。重返工作岗位，久违的笑容又回到母亲的脸上。

验检查，医生告诉我们，无法确诊就是肺结核，就按肺结核治疗吧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知道了一个医学名词：诊断性治疗。于是，住院数周后，母亲回家继续吃一种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——异烟肼。这种药一个疗程就是半年，且有不少副作用。母亲坚持吃了半年的异烟肼，再去复查，肺部的磨玻璃影及其他检查结果依然如故。肺结核治疗也告一段落，不了了之。

85岁之后，母亲身上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不断表现出来，我们四处寻医问药效果甚微。母亲的认知障碍表现得越来越明显，对于子女的姓名、称呼开始错乱。晚年的母亲，对重孙辈喜爱有加，就连最喜爱的重孙辈，也经常是张冠李戴，每每叫错。有时看到他们在面前嬉闹，母亲无奈地说道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，知道是自己家里的孩子，谁是谁，都分不清了，都分不清了。”

我们兄妹有时陪她说说话，说来说去，她突然戛然而止，看样子想说，但说不出来，只好无奈地说道：“我不会说了，不会说了。”那种困惑、无奈、无助的神情，让人为之叹息。

进入暮年之后，母亲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，几乎每年都要住一两次甚至两

三次医院。母亲既不悲哀，也不慌张，有几次病危后仍坦然面对。一次，她因肺炎住院，病情十分危急，经抢救后转危为安。一天早上，我去病房接班，透过门缝，传出一阵熟悉的歌声：“木（没）有共产党，就木（没）有新中国……”推开门一看，是母亲安详地坐在病床上，神情专注地唱着这首她最熟悉的歌。

2021年农历六月初八，是母亲92岁的生日，我们全家20余口给母亲庆生。晚上，母亲突然发起烧来，我们赶紧把母亲送到医院。

母亲这一生，不知多少次进出医院，但是这一次，母亲再没有走出医院的大门。在与病魔抗争了55天之后，母亲最后一次睁开眼睛，深情地看了看围在她周围的子女，然后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

这位15岁参加民兵，16岁入党，18岁脱产参加革命工作，38岁之后独自撑起一个家的坚强女性，历尽挫折磨难、刚强一生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“忠心耿耿干革命，光荣在党七十五年忠诚可鉴；母爱殷殷为家庭，含辛茹苦七十余载恩泽后生。”在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，这副挽联表达了子孙后代对母亲的崇敬之情。

**往事如昨**

##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

盖少艳

为照看十几亩地，父亲决定不出去打工了。他给自行车绑上几个袋子，里面装着秤杆子，走街串巷吆喝着收破烂。那崎岖不平的山路，留下了父亲忙碌的身影。

有一次，父亲收购了一辆拖拉机，赚了不少钱，母亲买回一盆猪骨头。猪肉的香味飘满屋子，我们姐妹三个洗干净了手，骨头一上锅就开抢了。母亲笑眯眯地叮嘱：慢点啃，别烫着。

街上收废品的人越来越多，父亲又改行卖爆米花。爆米花装进大编织袋里，因为体积大、重量轻，父亲便在自行车大梁上拴一块很重的铁块坠着。我经常趁父亲不注意靠近编织袋，偷爆米花吃。

我们交学费的时候，母亲总拉开抽屉，拿出大小面额不一的钞票。母亲数了又数，确定数对了，才递到我们手里，叮嘱：“一定装好了，千万别丢了，这是你爸赚的辛苦钱。”

年底，父亲骑自行车去莱西贩鞭炮，夜里很晚才回来。父亲低声和母亲说：“往回走的途中被安检的拦截了，没有贩卖鞭炮的证明一律扣押。”等到把鞭炮带回家，已过最佳销售时间，母亲让父亲宽心，说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母亲给我们添置了新衣服过年，自己却一件也没准备。

开春，父亲去冷库进了一批冻猪头卖。每到星期六、星期天，我就骑自行车跟在父亲后面吆喝：“卖猪头肉喽！”父亲负责称重量，我负责算账，那些大娘大婶都夸我账算得又快又准。父亲又联系海阳一家工厂卖洗衣膏。父亲把自行车后座改造得又宽又长，一次能载10箱洗衣膏，一箱能赚5块钱，父亲一天跑两趟，卖20箱就是100块钱，收入很可观。有一次突遇大雨，他把自行车赶到农户的屋檐下，自己则躲在了鸡棚里。雨后父亲回家，身上全是鸡屎。

父亲靠做小买卖供我们念完了书，我们相继工作了。腊月我和大嫚带着年货坐车回家，我和大嫚都晕车。父母商议后，不顾我们的反对做出了个惊人的决定：把家搬到我们工作的城市。父亲为筹钱装修，去浴池学搓澡，中午就是一碗白开水、一点干粮……

好多年后的一个午后，我和父亲母亲坐在炕上。那时我也做了母亲，6岁的儿子在旁边。我忽然发现母亲脖子上有一道疤，就问：“这疤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母亲淡淡地说：“有一年，你和大嫚要回去上班，我就去市里做了甲状腺手术。”母亲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：“做完手术，血把衣服浸透了。你爸白天收破烂很累，晚上来趴床边睡了还打呼噜。我做完手术嗓子很干，想喝水却喊不出声音来……”

母亲平淡地讲述着，我羞愧不已，感觉亏欠父母太多太多了！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父母的恩情，我们一辈子都无法报答。